

胡适·鲁迅·莫言

——自由思想与新文学传统——

庄森\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胡适·鲁迅·莫言

——自由思想与新文学传统——

庄森 \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·鲁迅·莫言：自由思想与新文学传统/庄森著. 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5.5

ISBN 978-7-5161-5291-1

I. ①胡… II. ①庄… III. ①胡适(1891~1962)—文学思想—研究②鲁迅(1881~1936)—文学思想—研究③莫言—文学思想—研究
IV. ①I206②I210.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7351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郭晓鸿

特约编辑 王冬梅

责任校对 郝阳洋

责任印制 戴宽

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
邮编 100750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行部 010-84083685
门市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20
插 页 2
字 数 308千字
定 价 66.00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-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庄森博士每次来，都会给我惊喜。这次来同样如此。他不仅带来了欢笑，还带来了他即将付梓的新作《胡适·鲁迅·莫言：自由思想与新文学传统》。这是继《胡适的文学思想》出版后，庄森博士的又一力作，不能不令人高兴。因为前一本书出版之时，庄森博士就不嫌老朽我懒散，请我写序，这次我就更难推托了，毕竟是朋友，是朋友就要做到底的。

这本《胡适·鲁迅·莫言：自由思想与新文学传统》虽与《胡适的文学思想》不同，但延续和贯穿了一条明显的脉络，这就是探索和追求文学中的自由精神，而且思想和视野更开阔了，更具有历史和美学的深度。

这无疑使我感到某种共鸣和欣喜。在人类文化史上，关于自由的论说和理论层出不穷，我所读所知甚少，不敢妄加评论，但是不能否认，即便从一种天性出发，我也无时不在享受着自由给予生命的欢愉和自在。每当我散步于大自然之中，看到野花在田野中盛开，蜜蜂在花丛中盘旋，鸟儿在天空中飞翔，甚至面对奔腾的江河，生机盎然的群山，无时不感到自由赋予人类的巨大恩惠和意义，感受到自然和生命在自由环境中所散发出的无限魅力。我想，这不仅是人与自然生机勃勃的基础和条件，也是人和自然的天性所在。如果没有自由，就没有生命多样性滋生和成长的空间，也就没有人类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性，也就没有人生的自在与舒展，更没有文学艺术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源地和源泉了。

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在历史上才有如此多的人去探索它、研究它、为它献上无数的颂词，甚至为它付出自己的生命。所以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诗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：

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

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

可见，一种理念或者一种论说的魅力，并不完全在于它如何宏伟和高深，而在于它实实在在地扎根于人和自然的天性之中，源自人对于生命和理想的追求和期待。

就此而言，把自由思想与新文学传统结合起来，探索文学创作中持续涌动的精神脉络，就不仅是一件很有学术意义的事，而且是文学研究的一种视野开拓。我也相信，这本书的出版，能够为当下学术研究提供一种更加深邃的思路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打开心灵、开阔视野，拓展新的空间。

衷心祝愿庄森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宽，越走越好。

再次感谢庄森对我的惦记与挂念。

钱谷融

2014.9.30

目 录

序	钱谷融 (1)
---------	---------

绪论	(1)
----------	-----

上编 胡适自由思想与新文学发生

第一章 胡适自由思想与文学革命理论	(2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一节 自由思想与文学革命发生	(2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二节 建设自由言说的新文学	(4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三节 诗体大解放的新诗理论	(6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二章 胡适自由思想与文学思想叙事	(8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一节 自由思想与平民文学主张	(8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二节 自由思想与写实文学主张	(10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三节 自由思想与传记文学主张	(11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中编 鲁迅自由思想与新文学发展

第三章 鲁迅的自由思想	(147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节 自由思想的内核	(147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节 绝不容忍的批判精神	(167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四章 鲁迅杂文的自由思想	(182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一节 鼓吹个性独立自由	(182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二节 批判奴性,追求人格独立	(199)
第三节 经济权保障自由思想	(214)

下编 莫言自由思想与新文学成就

第五章 莫言小说的自由思想	(230)
第一节 自由思想的创作立场	(231)
第二节 超越意识形态的价值观	(255)
第六章 莫言小说的批判精神	(281)
第一节 谵妄形象传递批判精神	(282)
第二节 谵妄人物承载批判精神	(291)
后记	(312)

绪 论

自由思想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话题，也是一种思想方法，“指运用理解力，致力于弄清任何命题的含义，探究支持或反对该命题的证据的性质，并根据证据的强大或不足来对命题进行判断”^①。科林斯还特别强调，自由思想的实质是不唯信宗教、权力，个人有自主的理性思考和追求真理的能力和权利。

自由思想是新文学的重要传统^②。新文学的自由思想首先是一种个人的能力及独立思考的个性，保持人格的独立，自主理性地思考问题，敢于以负责任的言行挑战权威，思考探寻真理。这种自由思想以个人主义为内核，作为一种价值体系，是对某种政治、经济、社会 and 宗教体制的一种态度或信念，最看重个人权利，认为人的其他所有权利都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，是个人权利的集合或表现。胡适、鲁迅、莫言是新文学的三位杰出作家。胡适创建了新文学的理论，指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，并开创了新文学的传统；鲁迅创作了新文学第一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显示了新文学的业绩，奠定了新文学的地位；莫言的小说把新文学推向一个顶峰，使新文学获得世界的认同，推动新文学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学，是新文学最重要的收获，“是一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得的”^③。胡适、鲁迅、莫言虽是从不同的角度为新文学作出特别贡献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——自由思想。这种自由思想的核心是不迷信权力、不畏权贵，体现为文学思想或文学创作使作家保持一种精神的独立，自主的理性思考，构建真实的文学世界，传示作家的批判精神。

① [英] 安东尼·科林斯：《论自由思想》，王爱菊译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51页。

② 庄森：《胡适·鲁迅·莫言：自由思想与新文学的传统》，《当代作家评论》2014年第6期。

③ 陈思和：《莫言的创作成就及其获奖的意义》，《文汇报》2012年10月16日第12版。

胡适是新文学的开创者，以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作为经典话语，突出自由思想的个人主义灵魂，鼓吹个性解放。胡适认为：“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（Individuality），他的特性有两种：一、是独立思想，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，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，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。二、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，不怕权威，不怕监禁杀身，只认得真理，不认得个人的利害。”中国被传统政治文化统治了两千多年，个人被彻底扼杀，造成了中国的僵死和落后。而“一个新社会、新国家，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，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”。所以，中国的出路是倡导个人主义，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，把自己铸造成器，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，爱自由爱真理，在思想信仰上独立思想，独立评判，不迷信权威，不崇拜教条，不固执成见，用“存疑”的眼光“重估一切价值”，同时要敢于负责任。胡适还特别强调：这“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‘健全的个人主义’。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（Ibsen）的著作，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。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：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，就是易卜生说的：‘你要想有益于社会，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。’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，像易卜生的《国民公敌》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‘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’”^①。

这种个人主义的内核是个人的人格独立，个人的思想自由，个人的社会责任——既敢于独立做事，敢于承担个人责任，又不怕权威，坚持真理。这种个人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周策纵评价说：“胡适向中国人介绍易卜生，促进了个人主义的传播。他向人们说明了易卜生反对法律、宗教、道德准则强制人们服从的理由。他说，易卜生认为：‘社会的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，不使他自由发展’。易卜生理想中的人生是‘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；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’。受易卜生的戏剧如《玩偶之家》《国民公敌》《群魔》的影响，胡适关注着

① 胡适：《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：再谈五四运动》，《独立评论》1935年第150号。

中国社会中妇女的低下地位，鼓励中国妇女起而反抗，争取自身的解放，培养自立思想。”^①

胡适提出，自由思想还是每一个人的权利，每一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，不会因言废人。公权不能强制个人改变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，不能强制推行权威者的意志和道德。欧洲文艺复兴以降，世界的文化发展呈现两大趋势：一是科学工业化；二是自由民主。科学工业化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，为自由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。反过来，自由民主又为科学工业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。这两者虽然相辅相成，但思想自由的发展更为重要。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，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，让人得到更多的自由，更充分地自由发展个人的个性，保障人的宗教信仰的自由、思想言论的自由。专制社会最毒辣、最阴险、最狡猾的手法就是假借国家的名义，剥夺每个人的自由，摧残人的个性，从而排除异己。因此，在专制社会里，没有人格、没有个性的谄媚拍马的小人，见风使舵的政客，曲学阿世的文佞大都会青云直上，官运亨通。反之会被独裁者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置之死地而后快。所以，要建立平等、自由、民主的国家，就必须清除奴性，让个人的个性充分地自由发展，培养出特立独行的风范，使每个人做什么都能问个“为什么”，独立思考，独立判断，不让别人牵着鼻子。胡适强调，这是一种“个性的表现。这种个性表现的怪物，是社会进化的种子，因为人类若是一代一代的互相仿照，不有变更，那就没有进化可言了。惟其有些怪物出世，特立独行，作人不作的事，说人未说的话，虽有人骂他打他，甚而逼他至死，他仍是不改他的怪言，怪行。久而久之，渐渐的就有人模仿他了，由少数的怪，变为多数，更变而为大多数，社会的风尚从此改变，把先前所怪的反视为常了。宗教中的人物，大都是些怪物，耶稣就是一个大怪物。当时的人都以为有人打我一掌，我就应该还他一掌。耶稣偏要说：‘有人打我左脸一掌，我应该把右边的脸转送给他。’他的言语，行为，处处与当时的习尚相反，所以当时的人就以为他是一个怪物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他虽死不改其言行，所以他死后就有人尊敬他，爱慕，模仿

^① [美] 周策纵：《五四运动史》，陈永明译，岳麓书社1999年版，第417页。

他的言行，成为一个大宗教”^①。

胡适认为，自由思想能保证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，把个人铸造成器，成为具有特立独行的风范，有使命感、有责任感的有益于社会的人。他强调自由思想的核心“个人主义就是将自己看作一个有担子的人，不要忘了自己有使命，有责任。不但孔子如此，孟子也讲得很清楚：‘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：此之谓大丈夫。’就是说大丈夫的人格要自己感觉到自己有‘修己以安人’的使命。再讲到杨、朱、庄子所提倡的个人主义，也不过是个人人格的尊严。庄子主要的是说：‘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；举世非之而不加沮。’这就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。老子、庄子都是如此……这个个人主义的趋势是一个了不得的趋势；以健全的民主自由教育哲学作基础，要做到‘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’；提倡人格，要挑得起人类的担子，挑得起天下的担子。宁可‘杀身以成仁’，不可‘求生以害仁’”^②。

新文学是自由思想的重要成果。新青年社团^③以个人主义为旗帜，在北京大学文科集结成帮，形成“社团暴力”，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，以一种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话语推动文学革命，建设白话文学理论，创造新文学，奠定了新文学的自由思想的重要传统。

传播学认为，信源的“可效性效果”指信源的可信度越高，说服效果越大；可信度越低，说服效果越小。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，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也迁到北京，获得北京大学精英资源的支持，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，其传播获得充分的“可效性效果”，影响力迅速发展和扩大，吸引和凝聚了全国的革新力量，掀起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，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帷幕并将其推向了高潮。

《青年杂志》时期，陈独秀对文学改革并没有成熟的想法，胡适对文学革命却情有独钟，认为“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”，提出“文学革命，需从八事入手”。^④ 胡适的论点让苦苦寻求文学革命启端的陈独秀发现突破

① 胡适：《学生与社会》，《共进》（半月刊）1922年第11期。

② 胡适：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》，《胡适文集》第12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87页。

③ 参见庄森《〈新青年〉团体的社团性质》，《新华文摘》2009年第1期。

④ 胡适：《通信》，《新青年》1916年第2卷第2号。

口，并以决绝的态度把“文学改良”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文学革命，发出“甘冒全国学究之敌”，“拖四十二生的大炮”做文学革命的“前驱”^①的战斗誓言。从此，《新青年》每期都有关于白话文改革的讨论，运用大量的篇幅，构建文学革命的激进话语，将文学革命作为一项重要议程，给予强烈的关注，不遗余力地进行鼓吹、宣传，反复强化，不断累积信息，提示公众注意它、思索它，“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”^②，从而使文学革命“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，成了全国的东西，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”。陈独秀“一往直前的精神，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”。^③

1918年3月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3号由刘半农负责编辑。《新青年》以《文学革命之反响》为标题刊登王敬轩的来信与刘半农的复信。王敬轩是钱玄同的化名，来信用嬉笑怒骂的笔调调侃林纾等人，讽刺：“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，不特译笔雅健，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，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。此可谓有句皆香，无字不艳。”^④刘半农在《复信》的开场白中，公开提出利用“双簧信”引蛇出洞的斗争策略：“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，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，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‘出马’，这也是极应欢迎，极应感谢的。”^⑤刘半农在信中采取骂人有理、全盘否定的极端态度，否定林纾等人的历史功绩，嬉笑怒骂反对者的荒谬。这场“双簧”引起公众的特别注意。从“运动”的角度看，在风云激荡的时代，社会黑暗，人心麻木，要想唤醒民众，实在需要制造刺激性效果，“双簧”戏也确实引起各界关注，推动文学革命向更深的层次发展，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参与，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胡适虽公开表示“骂人”的讨论不妥，但也认为“不容匡正”自有道理，并强调陈独秀“这样武断的态度，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。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，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，做推行者，不久

① 陈独秀：《文学革命论》，《新青年》1917年第2卷第6号。

② [美]沃纳·塞佛林等：《传播理论：起源、方法与应用》，郭镇之等译，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46页。

③ 胡适：《陈独秀与文学革命》，《世界日报》1932年10月31日。

④ 王敬轩：《王敬轩君来信》，《新青年》1918年第4卷第3号“通信”《文学革命之反响》。

⑤ 刘半农：《复信》，《新青年》1918年第4卷第3号“通信”《文学革命之反响》。

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”。^①

《新青年》聚“社团暴力”建构激进话语权威推进文学革命，并把文学革命推进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，这表明《新青年》极端自信、横蛮、激进，使得文学革命沿着“革命”“运动”的方式前行，《新青年》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。梅光迪就认为《新青年》是“以群众运动之法，提倡学术，垄断舆论，号召徒党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而又借重于团体机关，以推广其势力”。^②

文学革命以胡适的自由思想为“集体”意志，以个人主义建构新文学的激进话语，并传播、构建新文化心理结构，自觉地接纳新文学，推动新文学的发生、发展。因此胡适在北京大学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，“胡适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之后，北大师生中，文言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人很多，而文言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。傅、罗、毛、顾等人均是后一类。他们真正能够懂得用白话文的意义和道理。尤其是傅斯年，师从国学大师黄侃，并学着老师的模样穿大袍褂、拿大葵扇，原是很守旧的，在文学革命中，首先背叛严复、黄侃等导师，站在胡适等革命派一边”^③。文科的课程几乎焕然一新，一系列宣传新思想、新文学的课程搬上了讲台，而且几乎囊括所有新文学的课程，并逐渐占据主流，迫使旧文学逐步退缩。“文学革命，思想自由的风气，遂大流行”^④。在中国，北京大学文科的新式学生是引领社会潮流的先进知识分子，一举一动都为民众所仰慕效仿，尽管数量在当时并不太多，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长，为推动文学革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，对新文学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。

新文学还以胡适的个人主义为思想资源，凭借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影响力，扶持学生社团，培养学生领袖，带动学生推动新文学。

学生社团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形成的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硕果，老师和学生自由快乐地交流、畅快淋漓地讨论，突破创新，碰撞

① 胡适：《逼上梁山：文学革命的开始》，《东方杂志》1934年第3卷第1期。

② 梅光迪：《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》，《学衡》1922年第2期。

③ 沈卫威：《无地自由：胡适传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02—103页。

④ 蔡元培：《我在教育界的经验》，《宇宙风》1938年第56期。

出绚烂的思想火花，影响力远远超出北京大学。学生社团新潮社成立后，蔡元培每月从北京大学的四万元经费中拨出两千元供新潮社办《新潮》。李大钊则积极为《新潮》提供编辑场所，在图书馆拨出一间房子给新潮社使用。1919年1月，《新潮》创刊。1919年1月11日，钱玄同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大学生所办之《新潮杂志》第一册已出版，中以傅孟真、罗志希两君之文为最有精神。傅评马夷初之《庄子札记》，罗评林琴南之译小说，都说的很对。”^①

鲁迅极为关心《新潮》，每期都认真阅读，并提出指导建议，新潮社学生也极为重视鲁迅的指导意见。《新潮》第1卷第5号就刊登了鲁迅致《新潮》的信。鲁迅认为：“《新潮》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，也是好的。但我的意见，以为不要太多；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，譬如说天文忽而骂阴历，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。现在的老先生听人说‘地球椭圆’、‘元素七十七种’，是不反对的了。《新潮》里满了这些文章，他们或者暗地高兴。（他们有许多很鼓吹少年专讲科学、不要议论。新潮三期通信内有史志元先生的信，似乎也上了他们的当。）现在偏要发议论，而且讲科学，讲科学仍发议论，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，我们也可以无告罪天下了。总而言之，从三皇五帝时代的眼光看来，讲科学和发议论都是蛇，无非前者是青梢蛇，后者是蝮蛇罢了；一朝有了棍子，就要打死哟。”^② 新潮社“在反封建、毁礼教、鼓吹新文化和文学革命等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”^③，并逐渐成为新文学的中坚力量，文化心理结构悄悄地发生变化，思想观念悄悄发生转变，从而摒弃旧思想，接受新文学，使新文学由新生事物迅速成为文学主流。

二

自由思想是新文学最重要的思想资源。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发现“个人”的时代，提倡个性，追问个人价值，探询个人权利，成为新文学的主流。胡适以自由思想为指导，抓住中国言文分离的问题，提出

① 鲁迅博物馆编：《钱玄同日记》第4卷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724页。

② 鲁迅：《致〈新潮社〉》，《新潮》1919年第1卷第5号《对于〈新潮〉一部分的意见》。

③ 沈卫威：《无地自由：胡适传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03页。

用白话文学替代文言文，用活的语言工具替代死的语言工具，以满足现代人自由表达思想的需要，引发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革命，打破贵族与平民在使用语言上的界限，取消了少数人的语言霸权，并主张新文学以“人民大众”为本，使中国文学转向以普通民众为对象，推动新文学从旧文学的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，担负起揭露社会现实的启蒙重任。

胡适主张“诗体的大解放”，积极“尝试”白话新诗，“在大学里，我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此地也是‘文学革命’运动中心所在，‘我们能做的事’远比我预计的要多。我的讲义都是用‘白话’写印的，这在大学里还是创举。此地也有一小群人，他们和我一样，决心用‘白话’来作诗。上个月在百忙中，我们还是写了一些颇为可读的诗”^①。胡适高度关注人的解放，并始终把人的个性解放当成白话新诗的中心。封建社会以孝立国，顶礼膜拜祖先，完全扼杀人的个性，人只是回来传宗接代以延长上一代生命的工具，因此鼓励愚忠、愚孝成为封建统治的法宝。个人要获得解放，个性要自由发展，个人要独立自主，就必须彻底摧毁这种封建思想观念。胡适和陈独秀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。为了人的解放，新文学以“父子间没有恩”“儿子不一定非孝顺父母”作为倡导个人主义，铲除虚伪、愚昧的旗帜，猛击封建文化的要害。胡适的白话新诗《我的儿子》宣称：“我实在不要儿子，/儿子自己来了。”“树本无心结子，/我也无恩于你。”“将来你长大时，/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：/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，/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”^②。这种激愤的个人主义话语，完全是个性解放，追求个人的独立、自由的宣言，直刺封建文化的心脏，强烈地震撼着封建礼教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动，引起封建卫道士的强烈争议。

鲁迅是新文学最重要的作家。新文化运动初期，鲁迅紧跟胡适的文学革命步调，创作了一首小诗《爱情》，哭诉“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。爱情！我不知道你是什么”。这首诗控诉家族制度制造了无数没有自主爱情的痛苦婚姻，“我年十九，父母给我讨老婆。于今数年，我们两个，也还

① 胡适：《致韦莲司：在家里/在北大》1917年，周质平编译：《不思量自难忘：胡适给韦莲司的信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136—137页。

② 胡适：《我的儿子》，《每周评论》1919年第33号。

和睦。可是这婚姻，是全凭别人主张，别人撮合；把他们一日戏言，当我们百年的盟约。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：‘咄，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！’爱情！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！”^① 这是人觉醒后带血的控诉——连爱情都不能自主获得的人，连爱情的苦闷都不能控诉的民族，没有“人”的资格。这是回应胡适的《易卜生主义》批判家族制度，鼓吹娜拉出走，渴望各种自发的、自主的真情，勇敢追求爱情。这“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‘健全的个人主义’。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（Ibsen）的著作，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。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：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，就是易卜生说的：‘你要想有益于社会，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。’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，像易卜生的《国民公敌》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‘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’”。^② 这种个人主义的内核是个人的人格独立，个人的思想自由，个人的社会责任——既敢于独立做事，敢于承担个人责任，又不怕权威，坚持真理。所以，鲁迅还强调说：《爱情》这首“诗的好坏，意思的深浅，姑且勿论；但是我说，这是血的蒸气，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”。^③ 这种个人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。

相对白话新诗而言，新文学的散文创作成就更大，并创造了杂文文体。1918年4月，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4号开辟《随感录》专栏，成为杂文蓬勃发展的园地。鲁迅因此认为：“《新青年》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。”^④ 《新青年》创造的新文学体式——“随感录”迅速蔓延到各种报刊，“稍后，李大钊、陈独秀主持的《每周评论》，李辛白主持的《新生活》，瞿秋白、郑振铎主持的《新社会》，邵力子主持的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等，都开辟了‘随感录’专栏”。^⑤ 陈独秀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周作人、鲁迅等人的随感录虽各具特色，但都在短小的篇幅里传播个人主义，闪烁自由思想的光彩，充满旺盛的斗志，酣畅淋漓、明白晓畅，具有

① 鲁迅：《随感录·四十》，《新青年》1919年第6卷第1号。

② 胡适：《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：再谈五四运动》，《独立评论》1935年第150号。

③ 鲁迅：《随感录·四十》，《新青年》1919年第6卷第1号。

④ 鲁迅：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〉导言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46页。

⑤ 钱理群等：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47—148页。

很强的战斗力。胡适的《贞操问题》批判褒扬烈女自杀的野蛮风气，《美国的妇人》则主张妇女的自立，核心都是思索“人”的资格，个性的解放，人的自由独立。鲁迅的杂文则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。鲁迅认为：“中国的孩子，只要生，不管他好不好，只要多，不管他才不才。生他的人，不负教他的责任。虽然‘人口众多’这一句话，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，然而这许多人口，便只在尘土中辗转，小的时候，不把他当人，大了以后，也做不了人。”鲁迅将父亲分为“孩子之父”与“‘人’之父”两种。“第一种只会生，不会教，还带点嫖男的气息。第二种是生了孩子，还要想怎样教育，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，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”。^①

鲁迅的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是新文学初期有重大影响的杂文。这篇杂文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，作出“后起的生命，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，更近完全，因此也更有价值，更可宝贵；前者的生命，应该牺牲于他”的论断，他给出的到底怎样做父亲的方法有三点：一是理解；二是指导；三是解放。所谓解放，就是“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，但既已分立，也便是人类中的人。因为即我，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，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；因为非我，所以也应同时解放，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，成一个独立的人”。^②鲁迅对中国人最大的希望是“成为一个独立的人”，虽然也时常流露出悲观的情绪，“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‘人’，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，我们也不由自主，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：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”^③。虽然悲观，但鲁迅觉得只要每一个人都好好做父亲，孩子还是有希望成为真正的“人”，由此提出“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，肩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^④。因此，新文学散文的“最大的成功，第一要算‘个人’的发见。从前的人，是为君而存在，为道而存在，为父母而存在的，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。我若无何有乎君，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，父母是我的父母；若没有我，则社会，国家，宗族等那里会有？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

① 鲁迅：《随感录·二十五》，《新青年》1918年第5卷第3号。

② 鲁迅：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，《新青年》1919年第6卷第6号。

③ 鲁迅：《随感录·三十八》，《新青年》1918年第5卷第5号。

④ 鲁迅：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，《新青年》1919年第6卷第6号。